

國學叢書 胡適著

中國新文學小史

基本叢書——胡適

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

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

209
603

國學基本叢書

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

胡適

發行人 洪清泉

發行所 偉文圖書公司

台北市新生北路三段61號之15

電話 5941116~8(三線)

郵政劃撥 第0104043~2號

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053號

中華民國67年9月初版

中華民國74年3月再版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基本定價

9角

目錄

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

一

逼上梁山

四九

中國新文學小史

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

一

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歷史，我們至今還不能有一種整個的敘述。爲什麼呢？第一、因爲時間太逼近了，我們的記載與論斷都免不了帶着一點主觀情感的成分，不容易得着客觀的，嚴格的史的記錄。第二、在這短短的二十年裏，這個文學運動的各個方面的發展是不很平均的，有些方面發展的很快，有些方面發展的稍遲；如散文和短篇小說就比長篇小說和戲劇發展的早多了。一個文學運動的歷史的估價，必須包括它的出產品的估價。單有理論的接受，一般影響的普遍，都不夠證實那個文學運動的成功。所以在今日新文學的各方面都還不會有大數量的作品可以供史家評論的時候，這部歷史是寫不成的。

文學革命的目的是要用活的語言來創作新中國的新文學，——來創作活的文學、人的文學。新文學的創作有了一分的成功，即是文學革命有了一分的成功。「人們要用你結的果子來評判你。」正如政治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秩序，那個新社會秩序的成敗即是那個政治革命的成敗。文學革命產生出來的新文學不能滿足我們贊成革命者的期望，就如同政治革命不能產生更滿意的社會秩序一樣，雖有最圓滿的革命理論，都只好算作不兌現的紙幣了。

這一集的理论文字，代表民國六年到九年之間（一九一七——一九二〇）的文學革命的理論，大都是從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少年中國，幾個雜誌裏選擇出來的，因爲

這幾個刊物都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急先鋒，都是它的最早的主要宣傳機關。

這一集所收的文字，分作三組：第一組是一篇序幕，記文學革命在國外怎樣發生的歷史；這雖然是一種史實的記載，其實後來許多革命理論的綱領都可以在這裏看見了。在這篇文章說明之前我應該扼要的敘述這個文學革命運動的歷史的背景。這個背景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古文在那四五十年中作最後掙扎的一段歷史。（參看我的「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那個時代是桐城派古文的復興時期。從曾國藩到吳汝綸，桐城派古文得着最有力的提倡，得着很大的響應。曾國藩說的「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最可以代表當時文人對這個有勢力的文派的信仰。我們在今日回頭看桐城派古文在當日的勢力之大，傳播之廣，也可以看出一點歷史的意義。桐城派古文的抬頭，就是駢儷文體的衰落。自從韓愈提出「文從字順各識職」的古文標準以後，一些「古文」大家都朝着「文從字順」的方向努力。只有這條路可以使那已死的古文勉強應用，所以在這一千年之中，古文越做越通順了。——宋之歐蘇，明之歸有光錢謙益，清之方苞姚鼐，都比唐之韓柳更通順明白了。到曾國藩，這一派的文字算可是到了極盛的時代。他們不高談秦漢，甚至于不遠慕唐宋，竟老老實實的承認桐城古文爲天下之至美！這不是無意的降格，這是有意的承認古文的做作越到後來越有進步。所以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的自

序說：

「學者將欲杜歧趨，遵正軌，姚氏而外，取法梅曾（梅曾亮、曾國藩），足矣。」姚蕭曾國藩的古文差不多統一了十九世紀晚期的中國散文。散文體做到了明白通順的一條路，它的應用的能力當然比那駢儷文和模倣殷盤周語的假古文大多了。這也是一個轉變時代的新需要。這是桐城古文得勢的歷史意義。

在那個社會與政治都受絕大震盪的時期，古文應用的方面當然比任何過去時期更多更廣了。總計古文在那四五十年中，有這麼多的用處：第一是時務策論的文章，如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如王韜的報館文章，如鄭觀應，邵作舟，湯壽潛諸家的「危言」，都是古文中的「策士」一派。後起的政論文家如譚嗣同，如梁啟超，如章士釗，也都是先從桐城古文入手的。第二是翻譯外國的學術著作。最有名的嚴復，就出於桐城派古文家吳汝綸的門下。吳汝綸贊美嚴復的天演論，說「其書乃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嚴復自己也說，「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爲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其實嚴復的譯文全是學桐城古文，有時參用佛經譯文的句法；不過他翻譯專門術語，往往極力求古雅，所以外貌頗有古氣。第三是用古文翻譯外國小說。最著名的譯人林紓也出于吳汝綸的門下；其他用古文譯小說的人，也往往是學桐城古文的，或是間接模倣林紓

的古文的。

古文經過桐城派的廓清，變成通順明白的文體，所以在那幾十年中，古文家還能勉強掙扎，要想運用那種文體來供給一個驟變的時代需要。但時代變得太快了，新的事物太多了，新的知識太複雜了，新的思想太廣博了，那種簡單的古文體，無論怎樣變化，終不能應付這個新時代的要求，終於失敗了。失敗最大的是嚴復式的譯書。嚴復自己在群己權界論的凡例裏曾說：

「海外讀吾譯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譬其艱深。不知原書之難且實過之。理本奧衍，與不俟文字固無涉也。」

這是他的譯書失敗的鐵證。今日還有學嚴復譯書的人，如章士釗先生，他們的譯書是不會有人讀的了。

其次是林紓的翻譯小說的失敗。用古文寫的小說，最流行的是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聊齋志異有圈點詳註本，故士大夫階級多能閱讀。古文到了桐城一派，敘事記言多不許用典，比聊齋時代的古文乾淨多了。所以林紓譯的小說，沒有註釋典故的必要，然而用古文譯書，不加圈讀，懂得的人就很少。林譯小說都用圈斷句，故能讀者較多。但能讀這類古文小說的人，實在是很少的。林紓的名聲大了。他的小說每部平均能銷幾百本，

在當時要算銷行最廣的了，但當時一切書籍（除小學教科書外）的銷路都是絕可憐的小！後來周樹人周作人兩先生合譯域外小說集，他們都能直接從外國文字譯書，他們的古文也比林紆更通暢細密，然而他們的書在十年之中只銷了二十一冊！這個故事可以使我們明白，用古文譯小說，也是一樣勞而無功的死路，因為能讀古文小說的人實在太少了。至於古文不能翻譯外國近代文學的複雜文句和細緻描寫，這是能讀外國原書的人都知道的，更不用說了。

嚴格說來，譚嗣同梁啟超的議論文已不是桐城派所謂「古文」了。梁啟超自己說他亡命到國外以後，做文章即：

「自解放，務爲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爲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這種「新文體」是古文的大解放。靠着圈點和分段的幫助，這種解放的文體居然能做長篇的議論文了；每週一個抽象的題目，往往列舉譬喻，或列舉事例，每一譬喻或事例各自成一段，其體勢頗像分段寫的八股文的長比，而不受駢四儷六的拘束，所以氣勢汪洋奔放，而條理淺顯，容易使讀者受感動。在一個感受絕大震盪的過渡社會裏，這種解

放的新文體曾有很偉大的魔力。但議論的文字不能完全是情感的一條路的。經過了相當時期的教育發展，這種奔放的情感文字漸漸的被逼迫而走上了理智的辯駁文字的路。梁啟超中年的文章也漸漸從奔放到細密，全不像他壯年的文章了。後起的政論家，更不能不注重邏輯的謹嚴，文法的細密，理論的根據。章士釗生於桐城古文大本營的湖南，他的文章很有桐城氣息。他一面受了嚴復的古文譯書的影響，一面又頗受了英國十九世紀政論文章的影響，所以他頗想做出一種嚴密的說理文章。同時的政論家也頗受他的影響，朝着這個方面做去。這種文章實在是和嚴復的譯書很相像的：嚴復是用古文翻外國書，章士釗是用古文說外國話。說的人非常費勁，讀的人也得非常費勁，才讀得懂。章士釗一班人的政論當然也和嚴復的譯書同其命運，因為「不可卒解」。於是這第三個方面的古文應用也失敗了。

在那二三十年中，古文家力求應用，想用古文來譯學術書，譯小說，想用古文來說理論政，然而都失敗了。此外如章炳麟先生主張回到魏晉的文章，「將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更富有復古的意味，應用的程度更小了，失敗更大了。他們的失敗，總而言之，都在於難懂難學。文字的功用在於達意，而達意的範圍以能達到大多數人爲最成功。在古代社會中，最大多數人是和文字沒交涉的。做文章的人，高的只求絕少數

的「知音」的欣賞，低的只求能「中試官」的口味。所以他們心目中從來沒有「最大多數人」的觀念。所以凡最大多數人都能欣賞的文學傑作，如水滸傳，如西遊記，都算不得文學！這一個根本的成見到了那個過渡的驟變的時代，還不會打破，所以嚴復林紓梁啟超章炳麟章士釗諸人都還不肯拋棄那種完全爲絕少數人賞玩的文學工具，都還妄想用那種久已僵死的文字來做一個時代達意表情說理的工具。他們都有革新國家社會的熱心，都想把他們的話說給多數人聽。可是他們都不懂得爲什麼多數人不能讀他們的書，聽他們的話！嚴復說的最妙：

「理本奧衍，與不佞文字固無涉也。」

在這十三個字裏，我們聽見了古文學的喪鐘，聽見了古文學家自己宣告死刑。他們彷彿很生氣的對多數人說：「我費盡氣力做文章，說我的道理，你們不懂，是你們自己的罪過，與我的文章無干！」

二

可是在這個時期，那「最大多數人」也不是完全被忽略了。當時也有一班遠見的人，眼見國家危亡，必須喚起那大多數的民衆來共同擔負這個救國的責任。他們知道民衆不能不教育，而中國的古文古字是不配做教育民衆的利器的。這時候，基督教的傳教

士早已在各地造出各種方言字母來拼讀各地的土話，並且用土話字母來翻譯新約，來傳播教義了。日本的驟然強盛，也使中國士大夫注意到日本的小學教育，因此也有人注意到那五十假名的教育功用。西方和東方的兩種音標文字的影響，就使中國維新志士漸漸覺悟字母的需要。

最早創造中國拼音字母的人大都是沿海各省和西洋傳教士接觸最早的人。如廈門盧懋章造的「切音新法」，如福建龍溪蔡錫勇造的「傳音快字」，如廣東香山王炳耀造的「拼音字譜」，都是這個字母運動的先鋒。盧懋章的字母，在戊戌變法的時期，曾由他的同鄉京官林榕存運動都察院奏請頒行天下。蔡錫勇和他的兒子蔣璋繼續改良他們的「快字」，演成「蔡氏速記術」，開創了中國的速記術。

戊戌變法的一個領袖，直隸寧河縣人王照（死於一九三三），當新政推翻時亡命到日本，庚子亂後他改裝僞回中國，隱居在天津，發願要創造「官話字母」，共六十餘母，用兩拼之法，「專拼白話」；因「語言必歸一致」，故他主張用北京話作標準。（以前盧蔡諸家的字母都是方言字母，不曾有專拼官話的計劃。）王照是一個很有見識的人，他的主張很有許多地方和後來主張白話文學的人相同。他說：

「余今奉告當道者：富強治理，在各精其業各擴其職各知其分之齊限，不在少數

之英雋也。朝廷所應注意而急圖者宜在此也。茫茫九州，芸芸億兆，呼之不省，喚之不應，勸導禁令毫無把握，而乃舞文弄墨，襲空論以飾高名，心目中不見細民，妄冀富強之效出於策略之轉移焉，苟不當其任，不至其時，不知其術之窮也！（官話合聲字母原序）」

這就是說：富強治理的根本在於那最大多數的齊氓，細民。他在戊戌變法時，也曾「妄冀富強之效出於策略之轉移」；但他後來覺悟了，知道「其術之窮」了，所以他冒大險回國，要從教育那「芸芸億兆」下手。他知道各國教育的普及都靠「文言一致，拼音簡便」，所以他發憤要造出一種統一中國語言文字的官話字母。他很明白的說，這種字母是「專拚白話的」。他說：

「吾國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之音必與當時語言無異，此一定之理也。而語言代有變遷，文亦隨之。……故以孔子之文較夏殷之文，則改變句法，增添新字，顯然大異。可知係就當時俗言肖聲而出，著之於簡，欲婦孺聞而即曉。凡也，曰，焉，乎，等助詞爲夏殷之書所無者，實不啻今之白話文增入呀，麼，哪，咧等字。孔子不避其鄙俚，因聖人之心專以便民爲務，無「文」之見存也。後世文人欲藉文以飾智蓄愚，於是以摩古爲高，文字不隨語言，二者日趨日

遠，文字既不足當語言之符契，其口音即遷流愈速，……異者不可復同，而同國漸如異域。（同上）」

這是最明白的主張「言文一致」，要文字「當語言之符契」，要文字跟着那活的語言變遷。這個主張的邏輯的結論當然是提倡白話文了。

王照很明白一切字母只可以拚白話，決不能拚古文。他的字語凡例說：

「此字母……專拚俗語，肖之即無誤矣。今如兩人晤談終日，從未聞有相詰曰：『爾所說之晚爲早晚之晚耶？爲茶碗耶？爾所說之茶爲茶葉之茶耶？爲查核之查耶？』可知全句皆適肖白話，即無誤會也，若用以拼文詞，則使讀者在在有混淆誤解之弊，故萬不可用此字母拼文詞。（原第十二條）」

音標的文字必須是「適肖白話」的文字。所以王照的字母是要用來拚寫白話文的。後來提倡「讀音統一」的人，不懂得這個道理，竟把他們製定的字母叫做「注音字母」，用來做「讀音統一」之用，那就是根本違背當年創造官話字母的原意了。

王照的字母運動在當年很得着許多有名的人的同情贊助。天津的嚴修，桐城派的領袖吳汝綸，北洋大臣袁世凱，兩江總督周馥，浙江桐鄉的勞乃宣，都是王照的同志。袁世凱在北洋，周馥在南京，都曾提倡字母的傳授。勞乃宣是一位「等韻學」的專家，他

採用了王照的官話字母，又添製了江寧（南京）音譜，蘇州音譜，和閩廣音譜，合成簡字全譜。他在光緒戊申（一九〇八）有進呈簡字譜錄摺，說：

「今日欲救中國，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識之字不可；欲爲易識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他很樂觀的計算：

「此字傳習極易，至多不過數月而可成。以一人授五十人計之，一傳而五十人，再傳而二千五百人，三傳而十二萬五千人，四傳而六百二十五萬人，五傳而三萬一千二百五十萬人。中國四萬萬人，五六傳而可遍。果以國家全力行之，數年之內可以通國無不識字之人。將見山陬海澨，田夫野老，婦人孺子，人人能觀書，人人能閱報。凡人生當明之道義，當知之世務，皆能通曉。彼此意所欲言，皆能以筆札相往復。官府之命令皆能下達而無所舛誤；人民之意見皆能上陳而無所壅蔽。明白洞達，薄海大同。……（桐鄉勞先生遺稿卷四）」

我們看勞乃宣和王照的議論，可以知道那時候一些先見的人確曾很注意那大多數的民衆。他們要想喚醒那無數「各精其業，各擴其職，各知其分之齊限」，所以想提倡一種字母給他們做識字求知識的利器。

從庚子亂後到辛亥革命的前夕，這個「官話字母」的運動（也叫做「簡字」的運動

（逐漸推行，雖然不會得着滿清政府的贊助，却得了社會上一些名流的援助。吳汝綸於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到日本考察教育，看了日本教育普及和語言統一的功效，很受感動。回國後即上書給管學大臣張百熙，極力主張用北京官話「使天下語言一律」。吳汝綸死後（他死在一九〇三年），張百熙張之洞等的「奏定學堂章程」的「學務綱要」裏就有「以官音統一天下之語言，故自師範以及高等小學堂，均於國文一科內附入官話一門」的規定。這種規定很有利於官話字母的運動，所以在以後幾年之中，官話字母「傳習至十三省境，拼音官話書報社……編印之初學修身倫理歷史地理地文植物動物外文等拼音官話書，銷至六萬餘部。」（據王照小航文存卷一，頁三二）到了宣統二年（一九一〇）資政院成立時，議員中有勞乃宣，嚴復，江謙，都是提倡拼音文字的。他們在資政院裏提出推行官話簡字的議案，審查的結果，決議「謀國語教育，則不得不添造音標文字」，「請議長會同學部具奏，請旨飭下迅速籌備施行」。後來學部把這個議案交中央教育會議討論：主持教育會議的人如張謇，張元濟，傅增湘，也都是贊成這個主張的，所以也通過了一個「統一國語辦法案」。但不久武昌革命起來了，清朝倒了，民國成立了。在那個政治大變動之中，王照勞乃宣諸人努力十年造成的音標文字運動就被當前更濃厚的政治鬥爭的興趣籠罩下去，暫時衰歇了。（以上的記載，參用黎錦熙的